

中国农地流转的障碍及其出路

李长健,卞晓伟,吴 洁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促进农地流转合法有序地进行,运用法学和社会学理论,分析了当前国内农地流转在思想观念、基本制度、运行机制和流转动力等方面所面临的多重障碍。分析表明:从宏观规制方面坚守农地流转的基本原则,完善农民权益保护层面的利益协调,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安排好农地流转配套机制,这些都有利于进一步构建高效、规范的农地流转机制。

关键词:农地流转;农地产权关系;农地流转市场;农村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9)03-0005-07

农地流转,即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农地流转是促进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制度创新。中国农地流转问题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由农民自发推动的。在现实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依然无法突破封闭、凝滞的局面,出现供需不平衡、操作不规范、管理不科学、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农村经济的发展已经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农地流转问题进行了研究。如迟福林提倡把农地使用权长期交与农民,扩大农地使用权,模糊农地所有权^[1]。李录堂认为,要使农地流转起来,首先要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农民职业保障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选择是利用保险手段,以保险公司的社会职业保障功能来替代农地使用权对农民的职业保障功能,并在这种替代过程中通过保险公司形成一种实现农地流转集中的机制^[2]。何静认为必须赋予农地使用权流转一定的法律保障:在法律法

规中界定“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具体权利;强化使用权的继承权;明确使用权有偿转让的合法性,并对有偿额进行量化;规定各种流转形式的流转期限及土地流转涉及的乡村税费负担解决办法^[3]。这些研究都为农地流转的进一步规范、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农地流转中的新问题还在不断地出现,有关农地流转改革的方案还在艰难探索之中。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地作为一大生产要素,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必须在流转的过程中通过市场化来实现效益最大化。本文将从中国农地流转的成因探究入手,分析制约当前农地流转的诸多因素,从制度规则、农民权益保护、农地流转市场和配套机制等层面提出进一步促进中国农地流转的对策。

一、中国农地流转的缘起

马克思、恩格斯是较早对土地流转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马克思认为,经济流转是市场经济中最主要和最重要的领域,土地作为最主要的

收稿日期:2009-03-09

基金项目: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07SFB2043)

作者简介:李长健(1970-),男,苗族,湖南湘西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

生产资料之一,它本身虽然不能移动,但土地的权利可以转移^[4]。因此,土地权利流转是整个经济流转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土地流转作为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发展规模经济的重要途径,是外部环境和内生需求的必然产物,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规范。

(一) 外部环境:农地流转促成条件

第一,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的客观需要。农业产业化及产业结构调整蕴含的潜在经济利益在一些发达地区成为农民的自发要求。农业产业化是指农业与相关产业一体化的发展过程,实现这一过程要求农业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市场化决策。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原则,将资源合理配置到地方优势特色产业。以农户为单位的家庭个体经营无法满足规模化发展的要求,严重影响机耕、施肥、灌溉等农艺技术的实施,不能很好地利用先进技术装备,推广应用先进科学技术,不能实行专业化、集约化和现代化经营,阻碍土地产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这就必然要求通过土地合理流转(农户之间、农户与企业)达到土地的适度集中,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第二,农地流转得到地方政府的行政性推动。地方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行政介入,大大推动了流转的规模和速度。促进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成为不少地方政府追求的政策目标,并成为农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效益农业的战略措施。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国每年通过农户自发推动的土地流转率为1%~3%。但是近年来,土地流转在速度与规模上都有明显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介入,从政策上鼓励了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其信息、组织等优势,节约了交易成本,规范了流转程序,使规模经营的优势在一些地方得以发挥。

第三,农地流转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环节。当前中国农村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经济社会转变的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国家在这一特殊阶段提出的更高要求,也就意味着要用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形成新的产业发展规划、城镇体系规划、生态环境规划等。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和增长率的大幅下降,势必使一些农村宅基地闲置起来,同时城市房价的日益飙升,使许多城市居民产生了对农村住宅的需求,土地流转能够合理配置土地的使用权,适应城乡一

体化的现实需求,对于促进农民致富、减轻城市人口压力都具有积极作用^[5]。同时,为了推进农村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走适度规模的土地经营道路。使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土地相对集中,也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关键性的制度创新^[6],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一步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 内生需求:农地流转动力来源

第一,中国国情的现实需要。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必须满足的一个条件是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即提高生产要素的产出率。农业生产及土地经营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追求经济增长,当现存经营方式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时,这种经营方式就要改革。同时马克思认为,经济流转是市场经济中最主要和最重要的领域,土地作为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之一,它本身虽然不能移动,但土地的权利可以转移。因此,土地权利流转是整个经济流转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国目前土地的集约化经营还比较欠缺,在广大农村很多现代化的机械技术无用武之地,严重阻碍了土地生产效率的提高。农业用地使用权的流转,一方面可以满足生产经营者通过土地这种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而实现经济增长的要求;另一方面可以适应生产经营者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要素素质,增加生产要素产出效率而实现经济增长的要求。

马克思的地租地价理论认为: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即“真正的地租是为了使用土地本身而支付的。”地产权本质上是一种法权关系,而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就是地租^[6],其实质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获取的土地收益。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中国虽然已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但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着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存在着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分离的现象,这是中国仍然存在地租的根本原因。中国现阶段的土地经济关系要求建立相应的土地租赁和地租关系与之相适应,实行土地的有偿使用。在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条件下,中国实行土地有偿使用,促进土地流转的主要经济内涵就是要将理应归土地所有者的那部分地租统一收归国家或农民集体所有,实现土地收益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合理分配,实现社会的公平性。

第二,实现农民角色转变、保障农民权利的必然

要求。在当前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为改变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的不平等现状,关键是要实现农民由“身份”到“职业”的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革新。既要保证农民土地权利的充分实现,又要把农民从对土地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以期兼顾土地的经济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这就离不开土地合法有序的流转,从而实现对农民自身最有利的处分。只有当农民能够根据市场规则自由处分自己土地权利的时候,才意味着他们在获得财产上得到了平等待遇,充分保证了农民的平等生产权和平等发展权,使农民能够根据自身需求合理利用和配置土地资源,增加收入,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制约中国农地流转的因素

目前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存在诸多问题及其制约因素,虽然国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但是土地使用权流转发生率一直很低,农村土地仍然处于分散经营状态。因此,系统地分析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各种制约因素,对于推进土地使用权流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思想观念障碍:农地流转主体认识存在误区

现阶段土地本身所具有的承载功能、养育功能和资源功能,已经转化为农民的就业保障、生活福利和伤病养老保险的可靠手段。在当前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形成的时期,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普遍存在惧怕市场风险、对土地流转缺乏正确认识的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一些农民存在认识误区。有的农民对土地私有化心存幻想,认为承包期延长至30年,到时候国家政策变了土地就是自己的了,如果现在不争取承包土地将来会后悔莫及;有的农民认为,中国缺乏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土地既是“保命田”也是“保险田”,有了土地生活就有退路,即使外出打工赚不到钱还可以回来种田,心里踏实。因而宁肯种“粗放田”、“应敷田”,甚至不惜暂时抛荒,也不愿轻易转让和放弃土地。

第二,部分乡镇干部存在认识误区。有的干部不愿参与土地流转,对农地市场能否全面发挥作用,

应当控制还是应当完善仍有疑虑;有的干部不敢参与土地流转,把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与土地的合理流转对立起来,总怕突破国家政策界限,不敢大力宣传创新。正是由于这些认识障碍,不少地方农地流转的范围仍然较小,市场发育进程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国家农地流转制度的发展。

(二) 基本制度障碍:农地产权关系不清晰

由于产权关系的明晰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因此,土地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基础,土地产权关系清晰也是农村土地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础。但是,《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对中国各土地市场之间的产权关系规定得并不明确,甚至有些模糊不清。

第一,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清。中国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但集体又包括集体经济组织和乡镇集体等,到底哪个组织才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有关法律法规并没有明文规定。实践中,三级组织都参与土地管理,势必造成农地流转的无主状态和对权利人的权利侵犯。

第二,土地产权关系不明晰。从所有权看,农村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但没有土地处分权,集体土地的流转要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限制;从使用权看,由于农村人口变动或者乡镇领导更替,很多乡镇每隔几年就调整一次承包地,很大程度上侵犯了农民稳定的承包经营权。正是产权主体不清和产权关系不明晰,导致了集体权利缺失、农民权利受损、用地行为短期、耕地保护不力、农地纠纷增多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也是必须尽快明确土地所有权、防止土地资源浪费和集体资产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运行机制障碍:农地流转市场机制不健全

第一,农地使用权流转交易组织发育不健全。当前中国农村土地交易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少,场所、机构等相当缺乏,市场信息无稳定的传递渠道,土地金融信用未能发展,市场资金紧缺。一部分农民想转让使用权,而其他有经营能力的农民想规模经营,却找不到土地,往往形成“有市无场”的局面。因此,很多农民往往采取私下交易的方式来转包、转租土地。这种交易没有任何法律可循,没有任何监督机构保证运作,没有任何市场规则规范,交易缺乏透明度、公平性,社会交易成本高,而且交易局限在本村、本小组的狭小范围内,交易量小,成交的可能性

小,矛盾纠纷也比较多。实践中,还有一些地区在承包过程中,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强行从农民手中收回责任田,搞所谓“规模经营”,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第二,农地使用权的价格不能体现市场供求关系。构建中国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是一项包括价格、主体、运行、秩序、利益分配、供求等制度在内的综合性的工程。目前中国大宗农地使用权交易基本上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农地使用权的价格并不是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这种交易体制和机制体现不出农地使用权市场上的供求关系。

第三,市场中介体制匮乏。市场中介服务体制是市场本身形成的必要条件,然而中国目前法律对农地使用权流转中介服务机制没有专门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了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流转方式,但是对如何流转没有规定,这不仅降低了法律的可操作性,而且增加了土地流转的纠纷。

(四) 流转动力障碍:农地流转收益分享不合理

土地权属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土地所有权,二是土地使用权,即承包经营权。虽然中国相关法律均明确立法目的之一是保障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但至今尚无任何法律明确规定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何种权利,其与农地承包经营权、农地所有权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构成农民的财产权,目前尚无法律依据,这种不同的权利流转收益之间的关系不明确,导致承包者不能将土地作为财产看待,缺乏长远的收入预期,因此土地不能像一般普通商品一样在市场上流动,农地权利收益分割困难,导致收益分配的混乱。目前,国家对耕地占用实施严格控制。同时,按政策征用的土地,农民如何享受征地补偿费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只是由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可否享受或享受多少,这容易造成利益分割纠纷,引发社会矛盾。尽管从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出发,《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

三、促进中国农地流转的途径

农地流转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社会问题,其实质是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

实现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向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的转变,让农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让愿意留城的农民工能够成为市民,让留在农村的农民能够过上小康生活,让城乡资源可以合理对流并实现最佳配置。面对目前的农地流转困境,必须坚守流转中的基本原则,从农民权益保护、流转市场、配套机制等多层面入手,实施相应的改革措施,推动土地流转顺利、有序地开展,发挥其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

(一) 农地流转原则的宏观规制

第一,坚持基本耕地不减少的原则。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深入,农村耕地数量不可逆地呈现减少的趋势。作为耕地面积十分狭小、又要养活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为保障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产量,我们必须保证基本耕地面积不再减少^[7]。所以,在完善农地流转制度的过程中,要切实做到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每一块农地,坚持走节约耕地的路子,在农地用途的转移上,做到该流转的农地必须要深入论证、全面分析、精打细算,不该流转的要坚决不流转,杜绝乱用、滥用农地。

第二,坚持农地流转的自愿有偿原则。农户是土地流转的主体,对承包土地依法享有自主的使用权、收益权和流转权,有权自主选择是否流转、流转对象和流转形式。因此,在土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必须要充分尊重农户的意愿,对一些不愿意放弃农地使用权的农户,不要强行要求其放弃农地使用权,可以采取互换地块等办法加以解决。由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引导的土地流转应当公开透明,不准搞“暗箱”操作。坚决杜绝通过行政权力实行土地规模集中,这样只会损害农民的农地使用权,其结果可能有规模而没有规模效益。另外,土地承包权作为农民的一种资产,这种资产是能够获取收益的。收益既包括直接经营的收益,也包括流转土地的收益。土地流转的转包费、转让费和租金等,应由农户与受让方承租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收益应归农户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土地流转收益除依法承担的税费和乡村前期开发的投入外,应全部归承包户所有,以充分体现有偿使用原则。

第三,坚持流转多样性原则。由于中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市场化水平也各不相同,因此,健全农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可以搞“一刀切”,当前制定全国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条件尚不成熟。在依靠土地

为基本生存条件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要保证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和基本生活水平,注重公平,对农地使用权流转的限制要严格一些;在不依靠土地为基本生存条件的发达地区,在农地使用权流转上应强调效率优先,可以通过股份合作制等形式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同时,各地可以把多种流转形式相结合,把农民的自发流转和通过集体流转相结合,扬长避短,大胆尝试能够改进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土地流转方式。

(二) 农民权益保障中的利益协调

农民权益是农民作为社会主体存在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人类社会其他主体存在的前提条件^[8]。土地流转工作涉及面广,牵涉多方利益,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必须,将农民权利保护纳入法治化轨道,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第一,要尊重农民在农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中国农地政策的核心就是在30年内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农地使用权,无论农民是否在务农,是否仍以农为生,除非他放弃农地,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通过任何手段使农民失去农地使用权。农户这一土地利益的保障是任何形式的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基石,任何偏离这一原则的农地使用权流转都容易侵犯农民利益,导致农民农地权益的受损。构建农地流转机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制度化理念,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保护和激励农民的创业热情,这也是中国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9]。因此,土地处置权应由农民自己支配,即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方式和转让条件都应由农民根据自己的非农收入状况和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决定。

第二,要充分发挥农民在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中的作用。在当前发生的农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大多是各级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强制推动的,农民并不是市场主体。行政过度介入土地流转市场,必然导致交易行为扭曲、市场功能异化。在将来的土地流转市场中,农民必须成为市场交易的主体,农民的土地需求、交易主动性以及土地流转中直接或间接获利的愿望,是这一市场能否成功发展的关键。

第三,要维护好农民利益和农村的稳定。土地使用权流转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社区与农户、农户与农户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因此,要鼓励和支持农户之间的转包、转让、互换等土地流转形式;

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土地使用权流转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坚决杜绝以规模经营或搞“三高”农业的名义,将农业劳动力排挤出去,使农民失去土地,也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地租赁经营农户的承包地。

(三) 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

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是指在合理确定地租、地价的基础上,以转让、转包、租赁、入股等法律允许的方式进行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交易市场^[10]。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是实现土地合理规划、保障农民权益、实现流转顺畅的重要保障。

第一,建立统一、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机制。遵循市场规律,适应城市化进程的趋势,确保土地资源在不同形式的公有制下的完整性、统一性、平等性,促进城乡农地资源自由流动,突破土地市场的分割,建立城乡统一的以用途管制为中心的土地管理制度和统一的农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规则。同时,在稳定土地承包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开搞活土地承包权、土地使用权,允许农地进入土地二级市场,实现土地与劳动力、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第二,规范农地使用权交易行为,科学测算农用地流转价格。根据价值规律,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主要依靠价格机制的调节,因此,合理的地价是实现农村土地市场运行的必要前提,在农地流转过程中有必要选用适当方法对土地使用权价格进行科学评估^[11]。在充分考虑地价构成因素的基础上,对农用地进行分等定级、科学评估,确定土地的基准价格,以基准价格作为农用地流转价格的参照依据来确定具体地块的标定地价。

第三,培育中介服务组织和机构。实行土地使用权市场化流转是一项比较复杂的交易活动,必须培育并建立相关的市场中介服务组织和机构,如土地资产评估机构、法律咨询机构、信息传导和预测机构、土地保险服务机构、土地融资信托等金融服务机构。政府鼓励农民在中介机构公开进行土地流转,同时大力支持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创办土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在乡镇设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也可以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成为农地租借转让的桥梁。它们接收租出的农地,再将这部分农地租给欲租入者,这不仅可以促进农地流转的速度、效率,而且能够保证农地流转的成功率,为农

民提供保障。

(四) 农地流转配套制度的安排

第一,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机制。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束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没有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地制度的任何调整与变革都无法改变中国农村人地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矛盾,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促进农地流转和集中,最终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基本途径。目前,在中国制约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主要包括农村劳动力数量庞大、农业劳动力素质低下、城市就业压力大及观念落后等。为解决这些问题,有效地促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提高农村非农化水平,增加非农就业机会;重新构建城市化发展战略,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提供充分的空间;通过农业产业化开发,形成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吸纳机制。

第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在农村现行土地承包经营体制下,对农民来说,土地担负着就业、生存和提供社会福利等重要功能。不仅如此,在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没有普遍建立的情况下,土地还是农民养老和应付病残的最后保障。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从而加速土地流转。当前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要立足于现有基础,加快建立适合农村特点的就业、养老保险、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打破土地对劳动力的禁锢,使农民即便离开土地也不再具有生存上的后顾之忧,以顺利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加速土地使用权流转。

第三,完善政府职能,强化法制保障,预防和处理土地流转中的各类矛盾和纠纷。中国土地承包和流转的相关立法相对滞后,部分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导致了现实生活中土地流转的自发性、随意性,土地纠纷日渐增多。因此,各类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必须各司其职,重视对土地流转纠纷的调解和处理,建立土地纠纷预防和协调机制,防止矛盾激化。国家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要加强制度建设,成立中立的土地纠纷仲裁机构,或者设立土地法庭来专门处理土地案件,依法维护土地承包人和土地流转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土地流转依法有序进行。

第四,国家立法机构还要与时俱进地制定和完善中国现行的有关农地流转问题的法律法规,明确

农地产权关系,使农地流转的收益分享有法可依,从源头上使农民解除思想顾虑,并根据自身状况积极、理性地处理农地流转问题。

四、结 语

总体说来,农地流转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必要补充和完善。对待农地流转的问题,我们既不能因循守旧也不能盲目冒进,既要“稳定”好土地承包经营权又要实现土地的合理“流转”,既要注重效率又要兼顾公平,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新的契机,转变观念,创造条件,尽快把农地流转纳入到市场化、法制化的轨道,保护好农民的权益,在时机适宜的情况下积极推进农地流转。

参考文献:

- [1] 迟福林. 把土地使用权真正交给农民[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 [2] 李录堂. 试谈农地使用权保险与农地流转集中问题[J]. 江西农业经济,2004,22(6):6-7,16.
- [3] 何 静. 农地使用权流转与相关的法律问题探讨[J]. 经济问题,2001(7):44-47.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顾吾浩. 农地流转是完善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重大举措[J]. 上海农村经济,2008,28(10):6-10.
- [6]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7] 齐东文,代 征. 农地产权流转的主体和原则[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2(4):63-67.
- [8] 李长健. 论农民权益的经济法保护:以利益与利益机制为视角[J]. 中国法学,2005,22(3):120-134.
- [9] 帅晓林. 破解农地流转困境及其对策:构建农地流转机制[J].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4):5-10.
- [10] 郑景骥,葛云伦. 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方略研究[M].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 [11] 李长健,徐丽峰. 农村土地流转中基层权力主体的作用[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3):5-10,15.

Countermeasures for obstacles in China's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ence

LI Chang-jian, BIAN Xiao-wei, WU Jie

(School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Hube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of rural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legal transference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an orderly manner, this paper analyzes ideological concepts, basic system and the multiple obstacles in China's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ence.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it will be conducive to build a highly efficient, standard, and effective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ence mechanism so as to adhere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ence from a macro-regulatory level, improve the benefit coordination from the level of protecting farmers' rights and interest, establish the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ence market, and standardize the supporting mechanism.

Key words: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ence; agricultural land property relation; market for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ence; rural social security

(上接第 4 页)

- [2]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M].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6.
- [3] 陕西省人民政府. 长安: 天然历史博物馆[EB/OL]. (2003-05-15) [2009-05-20]. http://www.huaxia.com/zjss/sxht_sxgl_you2.htm.
- [4] 郭琦. 陕西五千年[M]. 西安: 陕西省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 [5] 刘生良. 诗经中的陕西诗歌考论[C]//中国诗经学

会. 第八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9.

- [6]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7] 高诱. 吕氏春秋序[C]//吕不韦. 吕氏春秋.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 [8] 许维遹. 吕氏春秋集释[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5.
- [9] 贾谊. 过秦论[C]//阎振益, 钟夏. 新书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10] 王启才. 吕氏春秋研究[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7.

Start of Chang'an Culture and its influence

LIU Sheng-liang

(School of Arts and Literature, Shaanxi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correct some bias or even errors in the research for Chang'an Culture, the paper, after the study and tracing of some historical documents, finds that Chang'an Culture should start in "Chang'an" the capitals of Han and Tang Dynasties and it is actually the general term of all cultures. The culture of Zhou and Qin Dynasties represents Chang'an Culture and they are also the important periods in forming and developing Chang'an Culture. They are the start of Chang'an Culture and should not be excluded from it.

Key words: cultural history; Chang'an; Chang'an Culture; Zhou-Qin Dynasties